

目 录

抗战时期曲江形势概述·····	叶放青 (1)
彭湃在曲江·····	石松林 (9)
张文彬同志在曲江的革命实践·····	李景昌 (13)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飞机空袭曲江概况·····	陈锡梅 (18)
清末学校评比点滴·····	黄宗达 (22)
记黄开光先生·····	黄宗达 (23)
忠于职守、克己奉公	
——陈居之事略·····	历 古 (26)
话说罗坑书房岩·····	何永福 (29)
曲江大坑口汽车站发展概况·····	严 实 (30)
粤汉铁路的修建过程·····	立理整理 (32)
清代及民国时期曲江县的市场	
贸易动态·····	何巫整理 (39)
建国前曲江田赋征收情况·····	穗 原 (44)
解放前曲江矿产业概况·····	梁观福 (48)
石达开二进曲江陷乐城·····	陈锡梅 (62)

抗战时期曲江形势概述

叶放霄

一、曲江的战略地位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迁来曲江后的形势。

曲江县(即现韶关市)向有“粤北重镇”，“南疆铜韶”之称，水陆交通方便，当时先后开辟了韶关南门飞机场、桂头机场、南雄机场。在战略上，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冬，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从连县迁来曲江。从此曲江成了战时省会，是抗战时期广东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中心，粤北成为广东抗日救亡的大后方。当时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省长、省党部书记是李汉魂将军，省所属机关、团体多在皇岗山麓、十里亭、五里亭一带。第四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为张发奎将军。1940年9月广东划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为余汉谋将军，以上司令部均在韶关师范学校。中共广东省委(地下)，其书记为张文彬同志；1940年冬中共粤北省委书记为李大林同志；中共北江特委(地下)，其书记为黄松坚同志；八路军驻韶办事处，其主任为云广英同志，上述机关均在河西黄田坝一带。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领导机关，省临工会在韶关下后街13号，由李伯球、郭翹然、陈卓凡、叶勇秀、黄桐华负责；该党在曲江成立过临时工会，由陈伊林、梅日新负责。此外，还有驻军、银行、公司、大专院校、中学、各种协会、报刊社团，除中大在坪石外，均从广

州，湖北迁来曲江县。如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在今大塘镇，广东省银行、省财政厅、税警团、中茶公司、中钨公司等迁来马坝；韶州师范也一度迁来马坝水车寮。韶关、马坝、龙归、周田、犁市、桂头、乌石、坑口等乡镇均有国民党驻军。李汉魂将军在犁市的艺州农场、南华寺等建有别墅，还常偕夫人吴菊芳女士去游览和居住，成了他们战乱中的行居。那时的曲江，可谓机关、学校、兵营、工商业林立，简易房屋、竹棚、木屋、竹织批挡房屋，在马坝、韶关市郊、东西河两岸比比皆是，当时曲江虽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曲江县城（韶关），原是个不足8万人的山城，此时人口暴增至34万。由于难民不断涌来，在粤北寻求安身之所者不下万计，据我所知，当时在马坝的界牌岭办有垦植场、石背办有畜牧场，莲花山林场，梅村、大塘均办有林场，安置了大批难民和失业家属；李汉魂将军和吴菊芳女士创办了广东省儿童教养院、力行中学、广东省立北江农工职业学校，有总院和七个分院，在犁市沙园等地安置了半工半读，半耕半读难童800多人。后来在当地结婚安家落户者大有人在，成为今日曲江人与清远、佛岗、南、番、顺、中山、珠江三角洲等地人民，建立各种亲戚关系的重要原由。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对曲江的重大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党政军机关、学校、社团，农工民主党等迁来曲江，（从1938年秋迁到连县，同年冬从连县迁来曲江，1944年秋，从曲江迁龙归、平远等地）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北江特委亦转移来曲江，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与日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对曲江的重大影响，主要如下：

（一）首先在思想政治上，唤醒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八年，曲江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步地从思想上分清敌友我关系，解决了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当时在我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总队的影响下，曲江县的爱国青年，先后在马坝、周田、龙归区成立了“抗先”分队，沙溪、乌石、花坪也建立了“抗先”组织，1939年3月，广东抗先总队从翁源迁来曲江县城，吴华（省青委书记）、陈思（副总队长）率领这支队伍达4万余人，深入城乡活动，运用街头讲演、戏剧、墙报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还通过办报刊，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使人民群众认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惨遭蹂躏深受其害，而曲江沦陷八个月，人民群众也大受其害。然而中国人民坚贞不屈，决心抗战到底，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时，广东驻军在张发奎指挥下，与日寇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战斗，把日寇压回广州。北面在薛岳将军指挥下，坚守长沙、衡阳，顶住了日寇南下。在第三次日寇“南北夹击”曲江时，余汉谋部不但不战，还洗劫了韶关商店，弃城而逃，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二）抗战八年，在广东省委、北江特委的领导下，中共曲江党组织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经受住了抗日救亡斗争的严峻考验。组织史记载：抗战暴发后，马坝地下党员开办了“救亡书店”，1938年春，广东省委派张尚琼同志到曲江，首先恢复了梁展如的组织关系。同年8月，成

立了曲江县马坝党支部，支部书记梁展如，副书记廖宣，组织委员何国文，宣传委员杨维常。在这期间，党组织先后输送了陈天任、杨维常、杨宣达、刘光军、杨刚、梁俊成、郑德辉、何庆宇、陈国具、邓术丁、杨惠先等一批爱国青年到延安学习，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1838年以来，曲江党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首先是各种形式的党训班纷纷在曲江举办，其次是中共曲江县委于38年6月成立，负责人是岑振雄。下辖马坝、乌石、省银行等5个党支部。39年10月，成立中共曲江中心县委，机关设于现韶关市内，有3个交通站，出版过《点滴》机关刊物，辖有曲江、乳源、乐昌、仁化4县党组织；到41年初，在曲江的党组织已有妇女总支、印刷工会、省女师、仲元中学、马坝、乌石、曲江中学等10多个支部，有党员130人，归中心县委领导。中心县委书记岑振雄、组织委员张尚琼、黄焕秋，宣传委员张尚琼（兼），后为吴震乾。40年10月，由于后北特委成立，撤销中心县委，曲江党组织归后北特委直接领导和管辖。后北特委书记陈祥、李宋练（后）。41年2月，后北特委调罗耘夫来曲江马坝工作，成立马坝、乌石特别支部，特支书记罗耘夫，组织尉儒、宣传郑瑞琪、何国文（后）。42年5月，“粤北省委”遭国民党破坏，特委遵照南方局指示，停止组织活动，已暴露的同志分散隐蔽，执行“三勤”，除特派员李宋练被捕牺牲外，曲江党组织未受损失。同年12月，中共东路工委负责人谢永宽派徐沂任中共曲江特派员，负责恢复和发展曲江党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徐沂同志于抗战胜利前夕遇难。

（三）在共产党领导下，曲江人民武装力量得到发展与

壮大。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寇欲打通粤汉铁路，占领曲江，实行“南北夹击”，形成了粤北大战的态势，39年11月至40年底，由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比较正常，国军在张发奎指挥下，在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众支持下，掀起了“农工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热潮。

44年冬，日寇采取了新的进攻策略，由阵地战转向分小股入侵，从南北两端同时发起攻击，从陆路、水路、并用空军配合，分散推进，合围曲江，至使曲江在四面强攻下，五天就沦陷了。在日寇侵占曲江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县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首先是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军事设施、交通、工厂、商店、学校、城乡居住区等损失惨重。仅37年和38年两年中，日机侵扰达277架次，炸死炸伤数千人；韶关南门机场、飞机制造厂被炸毁。37年至44年间，韶关风度中、风度南及风烈路等繁华商业区，先后遭到日机40多架次的轰炸，无数楼房被炸毁，损失惨重。尤其是38年6月28日，敌机一重型炸弹命中韶关关帝庙，庙内有200多躲藏空袭者，有170多人被炸死，10多人受伤，惨不忍睹。在马坝敌机也常来侵犯，多次轰炸马坝铁桥，山子背4号桥（未毁），省银行、中茶、中钨公司车队多次被炸。据说40年国民党65军158师，驻马坝沈屋背，一天全师检阅，敌机3架从广州飞来，随即对准目标俯冲投弹、扫射，死伤百余人，马匹、军车也有所损失，军官躲入冢沟才得幸免。当时对日机的空袭，廖辅叔（广州起义时共青团员、抗战时是1²集团军教官，解放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授，58年入党）有诗一首：“机雷推地坼，大海拍天游。生死差维未，流离满道周。断肠青玉案，极目绛云楼。始信临官哭，杭州误汴

州”。38年八路军驻韶办事处，由于日机轰炸频繁，向国民党省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部建议，安装电传防空哨及警报器得到采纳，曲江设防空袭措施始于此。

日寇占领曲江后，在城乡主要地段分兵把守，搜罗民族败类成立维持会、密侦队，四处搜索，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抢掠财物，无恶不作。农历正月初六，日军进犯大塘、枫湾一带，焚烧房屋400余间，打死打伤农民百多人；3月，驻马坝日伪军200多人扫荡潏溪，纵火烧烧屋，洗劫村庄。日寇、汉奸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曲江人民的愤怒和反抗。首先由马坝乡的共产党员杨维常、罗玉麟、陈乃仁、甘锦轩、陈志奋、丘世柱等同志，以苍村、演山为据点，组织起了一支130多人枪的抗日自己队，成立马坝乡抗日自卫委员会，以爱国民主人士杨际青为主任、罗玉麟、杨维常为副主任。不久，乌石乡共产党员梁展如、林永福、侯义强等同志领导的，以鹅鼻山为依托的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武装成立了，并与马坝联合抗日。为了与沙溪联成一片，把沙溪维持会争取过来，党组织决定派杨维常、杨宜民、甘锦轩前往沙溪找维持会长郭耀庭（有20多人枪），晓以大义，使郭撤销维持会，倒戈联合抗日。从而促成了“曲江县联乡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建立；抗委会所属武装有3个大队，5个中队和1个特务中队，有300多人枪和1个20多人枪的政工队，由何远赤同志任队长。这支队伍，坚持抗日锄奸，保家卫国，经历了大小战斗10多次，击毙敌人40多人，捕捉日军2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装备壮大了队伍。44年冬成立曲江民众抗日自卫队，活动于枫湾和县城、东西河两岸，打击日寇。45年夏，大塘维持会长何尧芳及其自卫队长王振倒戈反日，

歼灭日军一个班。15年5月，日军偷袭白沙乡梅子坝村，这支队伍又伏击日军10多人枪。不久又偷袭日军驻白沙军营，消灭20多名日军，缴获机枪2挺，步枪20多支，军用物资一批。周田沦陷时，日寇炮轰群众躲藏的山寨，洗劫村舍，奸淫烧杀，农民郑泰正、聂锦泰被日军抓住，用铁钉钉在木板上，活活晒死。农民张德云被击毙，有些农民被抓走下落不明。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周田人民的仇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抗日，保卫家乡。当时推举了开明人士何年荣（人称何老四）为大田乡抗日自卫大队长，李世恩等同志参加了该大队，有40多人枪，包括原国民党未及撤走的20多人枪，联合抗日。45年春，由我党领导的始兴风度大队，获悉日军用105只船装运缴获的枪弹、物资到韶关，通知周田自卫队，联合截击，这仗打得敌船横七竖八，被周田截获了敌98号船，毙日军多人，活捉1名，缴机枪1挺，枪支、手榴弹、布匹、大米、黄烟、纸一大批，以及军用地图、笔记等。在花坪，54年春节，日军130多人，突然进驻和霸占富国煤矿，其中周田小队的20多日军，物色了4个民族败类廖文汉为维持会长，张新才为便衣队长，和另5人组成日本密侦队，为虎作伥，强拆民房，建碉堡、设据点，抢粮杀耕牛为食，强奸民女，杀害了敢于反抗的农民姚善通、罗黑仔，烧毁民房10多间，血洗了龟塘村。农民逃入山中，半年不敢回来，造成田圃掉荒。当时原驻煤矿的国民党警备队，有百多人枪，从龟塘撤上大耙山，被汉奸带日军围歼，孤军迎战一天，弹尽粮绝，全部战死。后花坪有识之士伍书松（原国民党省府眷写员）和山下村民姚德明等于4月间，组织起花坪10多人枪的抗日自卫独立中队，并与石屋村陈全清为队长的30多人枪的

自卫队、仁化荷富村邓约山的抗日自卫大队（花坪有20多人在该队）互相支援，联合抗日，保乡保土。首先在推里村伏击了日寇30多人，毙1伤2。当仁化荷富村遭日寇进犯时，他们联合90多人枪，群众自发有100多人参加，前往救援，终于把日军全部围歼于一条山坑里，消灭20多人。七月间，该队又伏击了3名抢劫财物，拉走2名民女的汉奸，获步枪2支，子弹一批，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曲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各地抗日力量，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它在各地的驻军，大大鼓舞和激励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大长了人民志气，大灭了敌人威风，使曲江人民革命武装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枪，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曲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澎湃在曲江

石松林

澎湃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先驱，是广东农民运动的领袖。澎湃同志在早期农民运动的卓越贡献和影响，早已在全国人民中家喻户晓，成为激励后人前进的动力之一。然而，澎湃同志在曲江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却鲜为人知，本文试就澎湃同志多次在曲江组织农会、改组农会所作的贡献作一略述，以飨读者。

一、澎湃与曲江早期的农民运动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曲江农民饱受兵祸、匪患、天灾的痛苦和高利重租的剥削压迫，广大农民要求自身解放非常强烈。澎湃在海陆丰、广宁等县发动广大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打击地主豪绅的农民运动的消息传到曲江以后，曲江农民深受鼓舞，只是苦于无此机遇，没有一个带路人，还不懂得怎样去发动农民进行组织农会。

1924年9月，时值孙中山在曲江（韶关）筹划第二次北伐各项事宜，正当督师韶关，督师北伐的时候，孙中山曾两次电令以澎湃为团长的广东农民自卫军160余人（农讲所第二届学员组成）开赴韶关训练，并担任后方的宣传工作，随该团一起到曲江的还有谭平山、阮啸仙、罗绮园等人。同年9月20日下午7时从广州出发，21日凌晨到达韶关，由大本

营参军处指定在第13号兵棚驻扎。于当天下午3时，孙大元帅亲自集合工、农团演说。大意是：宣传比武力更为重要，以力服人者一时，以主义服人者始能永久。到韶后的第二天（22日），澎湃将全团分为10个小队，以附近韶关籍的学生作领队，分赴各乡村及城内进行社会调查，结果甚得当地农民的欢迎。此后，每日以4人为一队（共36队）到曲江数十里内的农村进行生活状况的详细调查，并向农民进行组织农民协会（犁头会）及农民自卫军之利益的宣传。仅几天时间，附近各乡村农民如久旱逢甘露，觉得宣传来得正是时候，无比高兴。纷纷派代表前往接洽，要求派人协助组织农民协会。但由于时间仓促，多数未能将农会成立起来。

据1924年10月4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曲江县翻溪桥、腊石坝两个村的犁头会（农会）的全体会员参加了同年9月29日在韶关南教场召开声援孙中山北伐的大会。澎湃和全体同志是9月30日离韶返回广州的，在韶关前后共11天，据此推理，翻溪桥、腊石坝两个村农会似乎应在9月22至29日成立。这样曲江县的农民运动是在澎湃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有的书上说阮啸仙是曲江农运的创始人，笔者认为也对），是澎湃等人播下的革命种子是无疑的。谓曲江的农民运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曲江的农民运动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

二、澎湃第二次到曲江 澎湃第二次到曲江，是在翻溪桥、腊石坝农会成立的影响下，出现了叶凤章、梁展如、欧日章等一大批农运骨干分子，经他们的宣传发动，努力工作，曲江县农民运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声势日益高涨，组织不断壮大。

至1925年秋，县农代会召开前，曲江全县成立区农会的有7个，乡农会141个，会员达11327人。各区、乡还相应建立起农民自卫军的武装组织，广大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曲江农运在彭湃为首的省农会关怀下，在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侯凤墀、刘胜倡等人的帮助下，经过充分筹备的基础上，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于1925年11月20日在曲江县城韶关下后街宏仁堂（现建国小学）内召开了曲江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12人。会议由刘胜倡主持，省农会代表彭湃率农讲所第五期110名学员于会议前一天由广州赶到韶关，参加北江地区第一个农会——曲江县农会的成立大会。彭湃向大会致贺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大会授犁头大旗和印章，亲自指导成立了曲江县农会的领导机构。会后，彭湃将学员派往曲江县城厢内外和附近农会演说。调查农民生活和农民运动的状况。彭湃本人在欧日章、侯凤墀等人的陪同下，不辞辛劳走路到离县城30多公里外的重阳暖水进行农村调查，在欧墨亲自召开农会干部座谈会，在会上，彭湃说：农民运动要搞起声势来，要打倒土豪劣绅，扩大武装，巩固政权。会议一直开到半夜两点多钟，欧日章的堂兄欧典章家颇有点财产，对欧日章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思想不通。彭湃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欧典章现身说法。欧典章经彭湃的启发教育后，变卖了家产，积极支持其弟欧日章的一切革命行动，他自己也从此坚定不移参加革命，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三、彭湃改组曲江县农会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初期，由于农民的政治觉悟还不很高，加入农会的人不够纯洁，对地主豪绅的伪装和阴谋一时未能识破，以至县农会的领导权被翻溪桥的大地主叶国棠一伙所篡夺。叶国棠利用他是县农会常务委员的权力，不断吸收地主豪绅加入农会组织，企图改变各级农会的性质，破坏曲江的农民运动。

1926年5月，在选举出席省二次农代会的代表会议期间，叶国棠一伙竟动用武装阻挠省农会北江办事处主任丘鉴志和特派员赖彦芳进入会场。一些区、乡代表愤怒退出会议，造成县农会处于混乱状态。叶国棠等强迫选举他和王朴民等4人为曲江出席省二次农代会的代表。在省农代会期间，省农代会决定取消叶国棠等4人的代表资格，拘留审查，并向全省各县农会发出《惩戒曲江县非法代表》的电文。这一事件的发生震动全省各县农会，影响很大。澎湃等同志派侯凤墀、赖彦芳、肖劲光到曲江重新召开会议，另选4位代表出席会议。

省二次农代会结束，叶国棠等人被释放回曲江后，因含恨省农会，遂到各处农村进行煽动，说省农会的坏话，使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会员怀疑省农会，以致造成曲江县的农民运动呈分裂状态。据此，省农会逐派澎湃、周其鉴、蔡如平等3位领导者亲自到曲江，依靠曲江县的党组织和农运骨干分子，一起深入基层，进行宣传发动群众，揭露叶国棠一伙篡夺各级农会领导权的阴谋和分裂组织、破坏农运的罪行。经过澎湃等人的细致的思想启发工作，使一些受蒙蔽的人清醒过来，对曲江县农会实行自上而下的改组，使各级农会的领导权重新掌握在革命者手中，并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通过再次召开县农代会，一致选举梁展如、欧日章、叶凤章等人为县

农会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从此，曲江县农民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曲江县农民运动是在彭湃亲自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它的兴起发展和壮大都是彭湃同志亲自关怀和领导的结果，澎湃在曲江的革命实践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曲江农运的光辉史册。

张文彬同志在曲江的革命实践

李景昌

张文彬是曲江人民熟悉的名字。他1901年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5岁参加共青团，17岁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平江暴动”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受党中央派遣来到广东，先后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粤北省委书记、“南委”副书记，较长一段时间在曲江（韶关）进行革命活动，为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作出过杰出的贡献。1942年6月因“南委”事件被捕，1944年8月牺牲在狱中。

张文彬是1939年1月初到曲江（韶关）的。那时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刚从延安参加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回来，同来的还有涂振浓、李殷丹、饶卫华、袁鉴文等一批干部，充实了各级党组织。当时广州已经沦陷，广东省委机关迁到曲江（韶关），他同李琼英、王均予以及部分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住在风采桥东侧一间租来的小楼里。同月初，张文彬

在韶关西河“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秘密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领导及部份党组织代表共20余人，博古代表南方局出席指导。张文彬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广东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在抗战中积极发展自己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统一战线和扩大党的组织力量的意见，这些意见最后形成了会议的决议，发挥了“三大法宝”的作用，推动了当时全省抗日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会议结束时，他亲自找了清远党组织代表万明同志谈话，指示回去以后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设法派党员打入三水县地方实力派人物伍观祺的“挺四”中开展统战工作，掌握武装。会议刚结束，他马上又深入到东江去贯彻扩大会议精神。那个时候，张文彬的工作十分繁忙，经常与其它省委领导研究工作，到基层调查研究，他曾来到马坝“救亡书店”了解曲江党组织的恢复情况以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同党员谈话。他常和在曲江（韶关）的“省抗先”、“省新生活妇女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李章达、陈汝棠等接触，共商抗日事宜。当广东省委与驻曲江（韶关）的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建立组织关系后，他与特支领导左洪涛、孙慎、刘田夫每星期见面，分析形势、互通情报、商量工作。指示他们要做好张发奎的统战工作，争取给“省抗先”以帮助，并勉励说：“党中央派你们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这步棋很好，希望你们要好好下活它！”二月的一天夜晚，张文彬到四战区驻地与中共特别支部全体同志亲切见面，并作了长篇政治形势报告，报告中还特别用黄励烈士因叛徒出卖被捕后严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英勇斗争的事迹向党员进行革命

纪律、革命气节的教育。报告后他热情洋溢地唱了一首《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歌》，给党员极大的鼓舞。

为配合抗战宣传，张文彬指示创办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于三月份在曲江正式创刊，刊址设在县城罗沙巷八号二楼。《新华南》刊物深受各阶层群众欢迎，每期均被抢购一空，销量超过当时在韶关出版的任何刊物。张文彬身体力行，常抽时间为该刊撰写专论、述评，代表省委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战宣传。

张文彬对党的建设是极为重视的，他根据当时面临恢复全省各级党组织而又十分缺乏干部的实际情况，提倡举办训练班加速培训党的骨干力量。1939年一年间，省委先后在韶关西河坝，曲江马坝演山谢屋举办了三期县级党员干部训练班，一共培训了100多名干部。张文彬强调党训班除开设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课程外，每期必设游击战争课程。他和其它省委领导虽然工作很忙，但也经常亲临训练班讲课。八月间，省委第二期党训班选择在离韶关20多公里的偏僻山村——马坝演山村举办，张文彬曾在交通员的陪同下步行到这里检查工作，向党训班班主任苏曼同志详细地了解办班情况，从学员的学习、思想到生活问题都问得很仔细。他指示，一定要做好隐蔽安全工作，一定要加强游击战争这门专业课的教学，多让学员做沙盘作业，使理论更好地联系实际，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武装斗争的需要。在党训班检查工作期间，他还亲自给学员作形势报告及讲解保密工作原则。张文彬虽然自幼家贫，只读过初中，但他刻苦钻研、善于学习，斗争实践经验丰富，所以作起报告来针对性强，深入浅出，善于启发引导，很有鼓动性。据当年听过张文彬讲课

的同志回忆，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张文彬不仅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而且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很高，深受人敬佩。

张文彬同志还富有一股忘我工作热情和拼命学习的钻研精神。在曲江（韶关）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熬到通宵，身患肺病也毫不介意，时常边吃药，边看书报边写材料。他身为省委书记，月薪却跟一般工作人员一样，每月领12元，生活是够艰苦的。他外出时还注意看书看报，边看边思考，有时还做记录，时刻关心政局的变化。他不仅自己刻苦学习，对同志要求也很严格，他常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理论，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1940年春，张文彬从延安回到曲江（韶关），特意将《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发刊词》等党中央的文件藏在热水瓶里，混过途中敌人的检查，带回曲江来马上就吩咐秘书周微雨迅速刻腊版油印出来，发给各级党组织学习，让同志们能及时了解党中央的决策。

1939年11月，广东省委依靠民主爱国人士陈汝棠的掩护，在黄朗坝召开了五次执委会议。张文彬主持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守”的策略，提出了“既要坚持反逆流斗争，又要在斗争中积蓄力量”的方针，以对付当时的反共逆流。当韶关的国民党顽固派强行解散“省抗先”总部，要和“三青团”合作，并且不断对“抗先”进行迫害时，张文彬洞察敌人的阴谋，及时指示“省抗先”采取政治上坚持斗争，组织上做好隐蔽，以保存实力的方针，使“抗先”组织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有效地掩护抗先骨干力量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

1940年6月，省委在韶关帽子峰韶师林场召开省委扩大